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六月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六月

一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咨行國民政府，請就朱家驊擬呈之蒐集各種文獻圖書交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收藏，以便學術研究及行政參考之計劃，查照辦理。

國立廣州中山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朱家驊，前向中央政治會議廣州分會提出蒐集各種圖書皮藏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之計劃，經廣州分會會議決准如所請，並轉電中央政治會議核議。旋經中央政治會議決議轉請國民政府照辦，中央政治會議秘書處遂於本日將朱家驊原提議書一併咨請國民政府查照辦理。其咨文如下：

「爲咨行事。准本會議廣州分會代電：據中山大學委員朱家驊提議擬具蒐集各種圖書皮藏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附陳計畫，請予核議。經分會第二十五次會議議決，准如所請辦理，並附抄錄原提案書請轉函國民政府查照辦理等因；經提出本會議等九十九次會議，並經議決轉請國民政府照辦。茲特檢同原件函達，請煩查照。此咨國民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一日。」（註一）

抄附原提議書

立國天地間，必保持其文獻，非但供行政之參考，亦以資學問之研究也。不幸中國政府及私家自來不注意於史料之蒐集與保存，凡一時認爲不需者，及與學術界之正統思想不密合者，舉付一炬，遂至三千年來僅有畸形之史，而失去若干萬件正確之史料，思之痛心。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有鑒於此，設立社會文化部，中國革命歷年出版物收藏部，及中國近代外交史料部，廣收近代材料，以供衆覽，俾國民咸曉然於國際地位與國內利弊，喚起其革命工作之責任心。至於過去歷史及民間材料，雖似與現代政治無直接關係，而欲瞭解社會現象之積困及國民思想之癥

結。此等文件實占有極重要之地位，不得不由若干專門家作專精之研究，以完成根本之革命事業。故國立中山大學對於舊書籍、舊檔案及家譜民族材料等一律收集，然但從書肆購求爲數至爲有限，不足以獲得各方面之研究材料，爲此提出議案如下：

一、請由國民政府通令各屬機關及各市鄉之社會團體，凡有印刷品無論書籍、圖畫、告示、傳單均寄送二份至國立中山大學，其所積存之舊文件如：案卷、賬簿、信函、板片、等在各機關已認爲不需者，均送中山大學永遠保存。

二、請由國民政府通令各縣長，徵求各該居民之家譜、族規及各民族（如苗、瑤、撞、獐、蟹戶等）之材料。凡衣服、裝飾、武器、宗教、法物、圖畫、文字、歌謠、言語及各種文件記載，均在收集之列。應將各物品隨同說明書寄送國立中山大學，其家譜一項如除藏本外別無可送者，應由各縣長立據借取轉送國立中山大學，抄畢寄還，如須出資購取，亦可核發書價。

三、請由國民政府通令各縣長、各該縣之舊家大族，如有藏書出售，可將書籍名目及價值開送國立中山大學，以憑審定去取，如有肯將藏書贈入大學者，國民政府當給予褒獎狀或徽章等，以獎勵之。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亦當爲之在館中設備紀念品，以誌不忘。如贈書部數特多，更當爲之特闢一書庫，即以贈書人名名之，俾其所藏永遠完整，至金石、書畫等古物如肯讓與亦同此例。

四、請由國民政府通令南洋各領事，將華僑材料盡量搜集，凡領事署公文副本、海關報告、華僑自辦之報紙雜誌、出版之書籍、報告、圖畫、東西諸國關於華僑之記載，均隨時檢送國立中山大學，其關於南洋土人之記載亦可採寄。

總之廣東爲革命策源地，國立中山大學爲廣東最高學府，其所擔負之國民革命之任務特重。然欲完成國民革命之事業，必先對於古今歷史有全盤之探赜，而後可於因革取舍之間有確當之處置。此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所以刻意輯出以前之藏書成法，以徵求各種文獻材料之故也。謹此提議，懇即公決施行。提案人朱家驊。（註二）

國民政府公佈「副官處組織條例」及「副官任用規則」。

國民政府本日公佈「國民政府副官處組織條例」及「國民政府副官長高級副官及副官任用規則」。

其條文如后：

一、國民政府副官處組織條例

第一條 國民政府副官處置左列各職：

- 一 副官長一人，陸軍少將。
- 二 高級副官四人，陸軍上校。
- 三 副官六人，陸軍中校、少校。
- 四 差遣十二人，陸軍上尉、中尉、少尉。

第二條 副官處置左列各科：

- 一 總務科。
- 二 內務科。
- 三 管理科。

第三條 總務科職掌如左：

- 一 關於承宣命令事項。
- 二 關於本處文書撰擬、收發、保管事項。
- 三 關於本處會計、庶務事項。
- 四 典守本處印信。
- 五 其他不屬各科事項。

第四條 內務科職掌如左：

中華民國十六年 六月一日

中華民國十六年 六月一日

一一一六

- 一 關於典禮事項。
- 二 關於侍從事項。
- 三 關於調查事項。
- 四 關於交際事項。

第五條 管理科職掌如左：

- 一 關於警衛事項。
- 二 關於交通事項。
- 三 關於衛生事項。
- 四 關於軍紀風紀事項。
- 五 關於勤務事項。

第六條 各科事務分股辦理，其事務之分配，由副官長定之。

第七條 副官長承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之命，受祕書長之指揮，有管理本府警衛部隊之權。

第八條 副官處因繕寫文件，助理庶務，得酌用雇員。

第九條 副官處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十條 本條例自公佈之日施行。

二、國民政府副官長高級副官及副官任用規則

(甲) 副官長

- 一 曾任陸軍少將以上軍職者。
- 一 曾受高等軍事教育而有陸軍少將以上之資格者。

(乙) 高級副官

- 一 曾任陸軍上校以上軍職者。

一曾受高等軍事教育而有陸軍上校之資格者。

(丙)副官

一曾任陸軍中校、少校軍職者。

一曾受軍事教育而有陸軍中校、少校之資格者。

一確有軍事學識、經驗，努力革命工作，由主管長官保，由國民政府核准以陸軍中校、少校用者。

(丁)上述資格以在革命政府或在革命政府轄下之軍事機關任職者爲限。

(戊)遇資格有疑義時，令其提具證明書類，如任狀文憑之類。

(己)副官長、高級副官、副官須爲中國國民黨黨員。

(庚)凡曾有不忠於本黨之行爲者，非經中央黨部審查，證明其有悛悔實據，不得任副官長、高級副官及副官之職。

(註三)

國民政府任命劉民畏、韋一新、楊熙績、周仲良、沈礪、朱文中、王澂瑩、許靜芝爲國民政府祕書；(註四)並派楊熙績兼總務科主任，朱文中兼副主任；韋一新兼機要科主任，許靜芝兼副主任；劉民畏兼撰擬科主任，王澂瑩兼副主任。(註五)

國民政府任命戴傳賢爲國立廣州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爲副校長。

中山大學前身爲廣東大學，係由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改組而成。首任校長爲鄒魯，鄒氏於民國十四年十一月離粵北上，先後由陳公博、顧孟餘、經亨頤等主持校務。十五年秋，國民政府明令整頓校務，令設校務委員會，以戴傳賢爲委員長，顧孟餘爲副委員長，丁惟汾、朱家驊、徐謙爲委員。旋顧孟餘辭副委員長職，由朱家驊繼任。北伐軍底定長江，戴、顧、丁、徐四委員均離粵北上，中山大學校務乃由朱家驊負責。及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決取消中山大學校務委員會，恢復校長制，並於十六年六月一日任命戴傳賢爲校長，朱家驊爲副校長。(註六)戴未赴粵就任前，仍由副校長朱家驊負責校務。

附錄：

一、朱家驊：戴季陶先生與中山大學（註七）

中山大學的前身，是廣東大學。廣東大學是民國十三年國父把廣東高師改組而成的。三民主義就是在廣東大學的大禮堂裏講的，十三年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是在那個大禮堂舉行的。國父逝世後，中央於十五年中山艦事變後就把廣東大學改稱為中山大學，以爲紀念，並任命戴先生爲校長，命令發表之時，戴先生適在潮州養病，不能到任。十五年夏，中央特派中央秘書長周柏年先生北上敦促，校中學生會也派代表李翼中、陳紹賢、甘家馨等隨行。當時我剛巧接到中大聘書，要我任地質系教授兼系主任，正從北京抵達上海，遇見柏年先生，要我同去從旁勸駕，我便同到湖州。我們見了他以後，看他精神甚不正常，的確還需要休養。九月初，我先到廣州，大約不到半月，他也到了。不過他還很慎重，不願立即接事，因爲校內教職員學生，派別分歧，情形複雜，有國民黨青年團，有西山會議派，有斯的黨，有中社，有共產主義青年團，還有正式的共產黨員和跨黨分子。斯的黨是取英文 *Sick* 的字音，意思就是要用棒去打共產黨分子。這一派和西山會議派，算是極右派，中社是偏右的，國民黨青年團是偏左的，真是形形色色，無奇不有。那時代理校長職務的是經亨頤，幾乎天天風潮，鬧得天翻地覆，非澈底整頓不可。戴先生想推薦顧孟餘先生做校長，天天拉我同去，勸他接受，而孟餘先生則堅不肯。因此，戴先生建議中央，下令解散學校，組織校務委員會，負責整頓，教職員重新聘請，學生嚴加甄別，由他擔任委員長，請孟餘先生爲副，另請丁惟汾先生、徐謙先生和我三人爲委員。我的參加，他事先並未向我徵詢同意，大約以爲是個多年教書匠，而且事實上已經進了中大，所以把我列入。我們以十月下旬到校就職，立即召開第一次委員會會議。由於他們幾位在中央都另有許多重要職務，所以議決把日常的校務，交我全權處理。不過戴先生還是忙裏抽空，天天來校，所有主要方針，都是由他決定，然後由我執行。校中經費每月九萬元毫洋，實發只兩成現款，其餘八成之中，六成是公債，二成是金庫券。市場上實價，金庫券是八折，公債是二折，實際上全部經費只合四成八現款，就是等於毫洋四萬三千二百元。這四萬三千餘元，戴先生決定的原則，每月經常開支不得超過半數，其餘半數須專充圖書儀器設備之用。至於教職員的重聘和學生的甄別，他也指示了方針。教職員先詳細調查，凡參加過糾紛的，一律停聘。當時教

職員總數四百餘人，重聘的只七十餘人。學生二千餘名，甄別後，淘汰了二百餘名。以適在學期中間，新聘的教職員不能立即到校，所以留下來的學生先開補習班，補習英國算。那時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因北伐進展，都於十一月北遷，戴先生比較稍閑，所以他每天下午對學生講話兩小時，這些講話的紀錄，就是後來所發表的「青年之路」。十二月初，他奉蔣先生之命，有日本之行，行前，把校務作種種安排，親函廣州政治分會主席懇切關託，一面囑我密切聯繫，以求校務之順利進行，並且要我把經費省下一部份來，預備首都確定後，作為遷校之用。當時其他各校務委員，也隨軍事之進展，都在北上途中，只剩下我單獨支撐，到了次年春初，第二學期開始時，新聘的教師陸續到校，學生就正式上課。四月中，廣東清黨，校內清除了共黨分子四百餘人。五六月間，中央取消校務委員會，恢復校長制，發表戴先生為校長，我任副校長。七月，他從日本回來，見學校內部已經安定，校務也上了軌道，非常高興，因而越發積極起來，天天和傅孟真顧頡剛以及德籍教授等，討論發展計劃。他說，他從前認醫科既無藥可醫，法科更無法無天，現在醫科居然可以醫了，而法科也有法了，外界評論為之一新。因此，他對我表示謝意，並歸功於我，其實這是他的謙虛，因為大體方針，都是他策劃定的，我不過執行而已。

由於對學校前途的樂觀，他把家眷接到廣州，預備長住，不料秋間張發奎黃琪翔到了廣州，引起左翼分子蠢蠢思動，校內時常發現奇異的標語。有一天晚上，他從政治分會得到一個消息，氣憤之下，要立刻離開廣州，並提出辭職。我送他到香港，他要我一同北上。當時廣州政治分會知道了，就派人趕到香港，力勸我們回去，說是他們一定負責把惡劣分子悉數清除。不過戴先生已經起程，因此，我回到廣州後政治分會又要我到上海，勸他立刻回校。我到了上海，經一番勸說以後，他居然答應了，而且就同行南返。不料到了廣州的那天晚上，張黃之變就發生了。第二天早晨，我們得到消息，午後他們要求戴先生和我去參加他們開會，戴先生就堅決要離開，他說這是共黨的陰謀，我們不應坐困危城，為其利用，並且竭力勸我同行，因為從清黨以後，我也兼了政治分會的委員，當然也不便留在那裏的，這樣，我們又匆匆的離去了學校，把校務交給沈鵬飛教授代行。

張黃事變之後，戴先生就說，這是為共產黨鋪路。果然不出其所料，接着不久，就發生了共黨的叛變。這樣一來，廣州就根本變色，我們的回校，也就無從談起了，而且當時中央早已發表我任浙江民政廳長的職務，在催促之

下，不能不去接事，戴先生也不久被任爲考試院院長。其實他本人的志願，倒是要專心來辦中大，不想在中央擔任職務，他一再堅辭，說明學校的重要，尤其中大和黨的關係。但都未蒙聽許，只得受命，在心裏却是十分勉強的，有時和友朋談起，甚至痛哭流涕。

粵共叛變平息以後，政治分會一再來電，催戴先生和我返校，但戴先生既無法離京，我也不能離浙，一再向教育部和內政部先後分別堅決請辭，又未獲准，結果，只得換班辦法，輪流去校，我比戴先生更去得多些，有一年我曾去四次之多，時間在半年以上，每次大約住兩個月，把校務略爲整理後，又回到浙江，在我們兩人都不在校時，沈鵬飛很多事函電杭州請示，不得不批辦，實行遙領。如此，直到民國十九年。我們離校的時候，校務由沈鵬飛教授代行，可惜沈不善於行政，往往把校務弄亂，因此，我到後得重新糾正過來，極其費力。記得十八年底，有一次戴先生到校，我還在那裏，他發現我的做法，竭力規勸，以爲不可。他說我們兩人，既不能常川駐校，需要沈來照料，即使他有錯，不應明加糾正，使其難堪，他對沈特別表示感謝，處處爲之維護，這是他的偉大，而是我自問所不及的。

他對人還有一個長處。記得在張黃事變之後，他要我同離廣州。我對他說：「浙江第一次發表我爲農工廳長，沒有去就，第二次又發表我爲民政廳長，看來必難再辭掉，這次離校以後，怕不易再能回來，但你是一校之主，將來還是辭不了的，所以副校長的人選，不如趁早物色爲是。」他立刻對我說：「朋友共事，能彼此互諒，坦懷相共，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有多少人寫信給我，對你懷疑，我都置之不理。在你的方面，說我的人，當然也不在少數，想來你也一定和我採取同樣的態度。我兩人相處年餘，在友情上沒有一些損傷，實在可說難得之至。如果你必不能回校，我也立刻辭職，要我繼續負責，除非你也能同在」。說了以後，並且把很多的信交給我。這一點又足見他對我信任之專。

十九年秋初，我辭浙江民政廳長。他對我說，要把校務正式交我接替，取消副校長制。當建議中央設一董事會。但自願擔任董事長，另請胡漢民、鄒魯、孫科諸先生連我四人爲董事。後來中央就接受了他的建議，發表了命令。國立大學之設董事會，這是一個創舉。他所以有此建議，而且自願擔任董事長，正是他表示對這個學校的關切。

這樣，他雖然離去校長實際職務，但是在精神上，還是領導着這個學校。

十九年底，我奉調中央大學，戴先生很不以為然，但是中央命令，無可奈何。我到京就職時，他再三對我說，至少不可向中山大學拉教授，千萬勿拆一個，搭一個。這又表示他對學校的隨時關切。

總之，他始終對這個學校，特別重視。他認為這個學校的前身廣東大學是國父所手創，對本黨有歷史性的重要。照他本人的志願，他寧可不擔任中央的職務，來專心辦理這個學校。他一生事業，方面雖多，但是他對這個學校，可說時時刻刻念茲在茲。現在大陸淪陷了，在匪偽控制之下，學校已支離破碎，面目全非，不過我們相信，我們總有一天可以回到大陸，把這個學校重新建立起來。我們今天在這裏紀念戴先生，大家應該立定志願去達成這個目的。這樣我們才對得起學校，才對得起戴先生。

二、鍾貢勛：季師主持中山大學的五年（註八）

一、中山大學的三位校長

國父逝世到民國二十年的幾年當中，正是北伐完成，全國統一，由容共而清黨，以迄共匪叛亂，是一個複雜混亂而又是一個最偉大的時代。在這個偉大時代，國父手創而永久紀念國父的最高學府——國立中山大學是這時創建而發揚光大的。誠如我們最後一位而碩果僅存的校長陳可忠師說：「回溯本校光榮歷史，更追念鄒海濱、戴季陶、朱驥先三位校長對本校的慘淡經營，貢獻之多，建樹之大，是其他校長所比擬不上的。撫今追昔，真有說不出的感念！」可忠師三十七年奉命長校，在匪勢猖獗，神州板蕩之際，苦撐年餘，三十八年始獲准辭職來臺的。可忠師和中山大學的關係，始於十五年冬他自美返國之時，他擔任教授、系主任、理科主任等職到二十年離校，整整有五年半，以後又擔任校長，時間之久，僅次於海濱師了。

去（五八）年二月十二日，是戴校長季陶師在廣州逝世的二十週年，今（五九）年元月三日是季師八秩誕辰，特就他主持的中山大學的五年，作四十年後的追憶，以誌懷念的誠意。

季師在十三年本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方自四川返滬，始悉總理有容納共產份子加入本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之事。不欲轉入漩渦，故遲遲其行，屢奉電催，迫不得已，年初始來粵參加大會。旋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中華民國十六年 六月一日

，一中全會又被推爲中央常務委員，宣傳部長，又經總理指派爲政治委員會委員。但季師迭向總理陳詞，不願意擔任本黨中樞職務，而只願負一個教育機關工作。大會終了之日，即離粵回滬，這是他以後擔任中山大學職務的最早動機。三月間迫於各方面的敦促，始赴粵就職。總理在十三年同時創辦文武兩校，以備造就革命軍事和建設人才，六月黃埔軍校開學，季師奉命兼任黃埔軍官學校首任政治部主任，及大本營法制委員會委員長。本黨容共時期，共產和非共產的猜疑妬忌，是隨時隨地發生的，因而黨務政治的紛糾，更層出不窮。季師知道這是本黨兩個中心不能同時相容的基本問題；但他還是苦口婆心從事於兩方面的居間調停工作，一方面力勸本黨同志忍辱負重，盡力合作，首先屏除部下猜疑排擠的原因。一方面又進言於新加入的共產黨同志，要他們犧牲共產黨的黨籍，而完全做一個純粹的國民黨黨員，使本黨不致同時有兩個中心，然後一切紛糾乃可盡除，組織工作才不至於受無形的障礙！這時共黨的氣焰高漲，不可一世，怎樣聽得進這些逆耳忠言呢！總裁在「蘇俄在中國」內說：『共黨以「嚮導」週刊爲其機關報，並出版書刊，宣傳馬克斯主義。一方面更滲透本黨的宣傳教育工作，共黨份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論和階級鬥爭來曲解三民主義。只有他們用馬克斯主義曲解三民主義，纔算是「革命的思想」，反而指本黨黨員對三民主義的正確解釋爲「不革命」或「反革命」。最顯著的事件，就是排擠宣傳部長戴季陶，及青年部長鄒魯，致使其憤而離粵。』季師是在十三年六月被共黨戴上「不革命」「反革命」兩項帽子而辭去一切職務決然離粵的。季師在七月五日由滬致總裁的信內有云：「弟爲此說，詞誨而理昧，不足以盡意，然吾兄且誌之，三年後，當有明顯之例示吾人耳。」這是說三年後的清黨運動，季師的明智，先知先覺，更不止論人論事往往有當了。季師雖沒有當幾個月宣傳部長，但五月一日，總理因自晨至夜半，演講達五次之多，且有其他聚會，繼續工作到十五六個小時之久，遂至肝病劇發。其後美洲總支部以宣傳部長不注意總理健康，提起彈劾。雖然這個日程表不是他編排的，而季師引爲自責，三十三年致陳布雷先生信內還述及此事的。

二、校務委員會停課整理

國父逝世，中央於十五年中山艦事變後，就把國父手創的廣東大學改稱中山大學，以爲紀念。任命季師爲校長，命令發表之時，季師適在湖州養病，不能到校。夏天中央特派中央祕書長周柏年先生，偕同學生會代表李翼中

等北上敦促。季師自十四年國父逝世後，再度辭去各項職務，回到湖州家裏，沒有參與外事。而且想等病體稍愈，就出國赴歐美遊歷，把自己的身心，浸到世界的革命潮流當中，切實地洗練一番的。可是他對於廣東大學校長的任命，因政府的督促，同志同學的敦勸，尤其這是實現他辦教育的素志，所以雖然病體並未全愈，也就欣然勉力承受了。他在決定去粵接任校長職務時，有個宣言，表示他治校的態度。內有：除大學以外，一切政治職務上的問題，以及人事關係，絕不與聞。各同志友好見教，除關係大學教育問題外，恕不作答，請各同志好友十分原諒等語。又擬訂一個「赴粵後作法」：就是自持的態度，嚴守上述宣言，不任中央職務。自修守最近箴言，絕應酬，少見客，少演說。關於大學的用人行政，全聽中央的安排，校事以必須請顧孟餘先生負責為宜，如設副校長，則請孟餘擔任，孟餘不肯就，則請邵元冲先生。可是顧邵兩先生都因中央另有任務，這個責任，却落在朱驢先師的頭上了。驢師十四五年在北京領導學生舉行大規模的反段示威遊行，就是以後所稱的「首都革命」。「三一八慘案」後，被段政府通緝南下，正接了廣東大學地質系教授兼系主任的聘書。驢師同中央周祕書長及學生會代表去湖州勸駕，以季師病實未愈，精神亦不甚正常，的確需要休養，於答允來粵就職後，驢師於七月先到廣州。九月下旬季師到校，還不肯馬上從代理校長經亨頤先生手中接事。季師以校內員生，派別紛歧，形形色色，無奇不有，幾乎天天鬧風潮，鬧得天翻地覆，非澈底整頓不可。於是建議中央，下令解散學校，組織校務委員會，負責整頓，教職員重新聘請，學生嚴加甄別考試，國民政府才發表季師為委員長，顧孟餘為副委員長，丁惟汾、徐謙、朱家驊為委員。由於顧、丁、徐三先生在中央另有重要職務，於是校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議決把日常校務交由驢先師全權處理。十六年初顧先生辭職，驢師繼任副委員長。六月大學院成立，全國各大學均稱中山大學，於是總理手創而永久紀念總理的學府改稱國立第一中山大學（未幾又復舊稱），取消校務委員會，以季師驢師任正副校長。十九年九月季師辭職，驢師繼任，取消副校長制。不到三月，驢師奉調中央大學校長，在中山大學只比季師多了百天左右。

校務委員是十月十七日就職，大禮堂樓上樓下都坐得滿滿的。走廊和禮堂上下，站立着很多師生以外的生面孔，這是共黨份子一貫搗亂作風所特有的會場佈置，也是他們陰謀壓抑季師德望的計劃。果然，季師登臺演講畢，鮑羅庭及其黨徒亦相繼登臺，鮑登臺尚未啓齒，而散坐四週和站立走廊外面的共黨份子，就先來一個滿堂彩，大鼓其

掌，難以喧嘩。季師於是奮袂再度登臺，痛斥鮑等荒謬言論，詞鋒針對，犀利無前。我們不覺掌聲迭起，繼以歡呼，季師在這種激動情緒下雍容而退，共黨份子便呆若木鷄，不敢出聲了。事後季師向我們說：宣傳如作戰，首重精神懾服，要先聲奪人，要在籌策的時候爭取計劃週密的勝利，不是到短兵相接時去圖技擊之長了。季師在校務委員會成立典禮時針對鮑羅庭輩的鴛鴦，是即精神懾服，有雖千萬人吾往矣之慨。

校務委員會正式成立後，當天發出根本改造的佈告，就是一切規章制度，都要重新釐定。先行停課，切實建設。以下學期為新規的開始，全體學生一律復試，分別去取，所有教職員一律停職，另行聘任，附中附小另行劃出辦理。盡力刷新，盡除積弊，以期名實相符，成為純粹黨化的大學，用副黨國期望。這是國民政府命令所定的原則，委員會依照政府訓令，本此原則，詳細規畫後，順序公佈幾項整理的辦法。

委員會特別要求全體學生嚴守紀律，服從中央指導，致力於革命知識的訓練及革命工作的實行。凡屬革命同志，務期互相親愛，以總理天下為公的博愛精神，一致團結，直接對帝國主義及一切反革命勢力而征戰，並對農工民衆求學而努力革命工作。

三、安定進步與文科重要

十六年以後，中山大學是步入欣欣向榮的大道，中外學者紛紛應聘來粵。季師春間去日，三月返國。四月本黨清黨，校內清除共黨份子四百餘人，佔全校同學幾十分之二，這是十五年甄別復試效果的再活。六月季師返校，見到內部安定，校務也上軌道，非常高興。季師說：「他從前認為醫科既無藥可醫，法科更是無法無天，現在醫科居然可以醫了，而法科也有法了。醫科待醫，法科無法兩句話，不到半年之久就能够取消了。」

新聘教授，各科都有，尤以醫科所聘德籍教授為多。計有古底克（Prof. Dr. Kodik）、內科柏理斯博士、外科馬丁博士、生理巴斯納博士、產護科沃而博士（抗戰時還在北平開業）等八人。農科方面，也請了兩位德國人，一位農業家和一位森林家芬次爾教授（Dr. Venzel）。理科方面請了德國的葉格爾、瑞士的湯姆（Prof. Dr. Arnold Heim）教授及陳可忠師等。

法科方面新聘的教授更多，我只記得何畏（思敬）何思源（仙槎）兩先生是十五年冬到校的。兩位都是接近羣

衆肯和學生打成一片的，不過前者接近CY份子，而後者和所謂樹的黨同學很好而已。「樹的黨」是共黨加於國民黨忠實份子的外號，說我們常帶Stick進會場，預備打架之用，其實共黨份子到是常帶木棍的。何思源先生在清黨前後常常參加在大禮堂的集會，遊行時和我們一樣揮舞小旗喊口號。何先生回山東任廳長及主席時，有信給我，盛稱那時師友之間的感情。

我是十五年由預科升文科的學生，十九年六月畢業前文科方面的情形，我比較了解而記得多些。季師十六年曾接眷來粵，預備長住，在校有幾十次訓話，都是有關青年反省及救國救世立己立人的道理。季師說：「作是序時，淚隨筆注，結論一篇，勸請全國青年勇猛精進，努力於備戰救亡。余是時豫測十年之後，中國必受帝國主義之殘暴攻擊。……此書出版，剛及十年，而蘆溝橋之變起。」這是「青年之路」重印自序，當年講演，是星期一的紀念週和星期三下午三至五時，季師每次都是用抑揚頓挫的聲調，講出那些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語！演講時常常聲淚俱下，不只是寫序文時淚隨筆注的！

「青年之路」分三篇二十章，也就是二十幾次訓話的紀錄。第二篇「對於中山大學的希望」五次講話，首先講「中大各科的現狀，第一就是講文科。他說在文科方面，我們得到好幾位熱心的教授，做了許多新的設計，對於文科，嚮望甚殷，曾有許多意見提出。他認為一個綜合大學的生命在文科；一個民族文化的主動力在文學、哲學、宗教、美術的思想；一代革命的創造力造端和完成，也在於此。文科關係之重大，不待特別說明，凡是稍有思想智識的人，都能够見到。而且在學術上，文科和任何一科的關係，都很密切。歷史學、地理學、和國文學，這三科的進步和發展，是一切學術建設的基本。尤其中國今天的情形，上述三種學問，可以說都是一片荒地，正雜生着若干亂草，開拓整理的工作，全在從今天努力作起。而且這三種學問，又都是異常困難的。不單是學問困難，並且在思想上，在實際上，常常含着不少的暗礁。越是關係重大，便越是不易進行，而又不能不勉力作去。季師說：『我想說一句奇怪話，就是：「只要真能把文科辦好，革命的前途，便有了八分的把握。」這或者不是一句過分的話。的確，文科的困難和重要，真是如此。並且無論那一科，都可以借材外國，只有文科，當中許多重要科目，是絕對不能借材外國的。我們今後，必須要努力把法科辦好，建國的基本問題才有解決的方法。法科幾個最基本的科目，便完

全是荒地，而這些荒地，也是絕不能單靠法科獨力去開，非和文科通力合作是不行的。……我只有以二十分的誠懇，希望全大學各位教授，認清楚文科的關係重大，諒解文科發展和進步的困難，努力扶助文科的設備和工作。更希望文科的教授，切實地擔負起這一個很重大而困難的責任。」

十九年一月，季師返校分別召集各科教授研究討論各該科的問題。某日討論法科問題時，季師說：今天我們討論法科的問題，兄弟除請朱副校長及沈事務主任（鵬飛）陳教務主任（宗南）之外，並請文科劉副主任奇峯、哲學系崔主任載陽、史學系沈主任剛伯諸先生前來參加。這是因為法科的問題，與文科處處有密切的關係，今後法科的發展，處處要文科的襄助，所以請文科各位教授也來參加，這是季師對文科特別重視的一般。

四、文科幾位有名的教授

文科在廣東大學時期，郭沫若沒有去總政治部做科長以前，曾經擔任過短時的學長，於是創造社的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王獨清等都混進來了，他們分授文學概論、小說、戲劇等課程。二十七年郭沫若任政治部廳長，我因新華日報於三月一日在武漢創刊，二月廿八日奉急電由粵調漢主持新聞檢查工作。郭知我出身中大文科，某次記者招待會後和我攀師生之誼。我說：那時是預科學生，還沒有資格聽你的課呢！

校務整理委員會續聘的文科老教授，有徐信符、古公愚、吳康諸先生。國外歸來和他處聘來的新教授，有周樹人（魯迅）、傅斯年、楊振聲、劉奇峯、莊澤宣、許德珩、丁山、顧頡剛、羅膺中、羅常培、汪敬熙、伍叔儼、吳瞿安、沈剛伯諸先生。

魯迅是由廈門大學來的，他在廈大因反對胡文虎而被迫離開，帶來了十幾位轉學生。（在嘉義工職任教而三年前逝世和我同屆教育系的谷中龍兄是其中之一。）他任教務主任（那時不稱教務長）兼文學系主任，開了「文學概論」「中國文學史」「中國小說史」三課。前者以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做教材，選修的有兩百多人，而且其他科系亦有慕名選修的，所以只好夜裏在大禮堂上課。那時沒有擴音設備，他的嗓門很低，滿口紹興官話，講課時完全是紹興師爺派頭，慢吞吞的，又不照着教材講，廣東同學莫名其土地堂，只好紛紛打退堂鼓，剩下我們文學系幾十個必修的同學了。他第一次登上大禮堂的講臺說：能够站在孫先生講三民主義的地方講課，是深感榮幸的！說到

自己學歷，去日留學之初是學天文，以後改學地質，兩樣都不成而來搞文學，是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茫茫兩頭都落空。」十六年三月清黨前，不知是因為聽課的人少；抑或奉了左翼文壇的指示，突然辭職帶着那時尚是助教名義，而實則早已在大沙頭車站對面洋樓同居的許廣平女士去上海了。

傅斯年（孟真）師十五年多回國來校，擔任文科主任，魯迅去後兼文學系主任，（胡頌平兄的駱師年譜十七頁：『先生請傅斯年為文科學長，「實際等於文學院長」』是錯誤的。）十七年語言歷史研究所成立又兼所長。十八年下期離校，由劉奇峯師繼任文科主任，羅膺中師任文學系主任。我們十九年第四屆的畢業證書到九月發給，是駱師校長署名，文科主任劉奇峯副署，實則六月間畢業典禮時，尚是正副校長時代。又胡著駱師年譜頁第九行「以翁之龍為醫科主任。」可見當時不是「學長」、「院長」之稱的。

孟眞師博學多才，開的課很多，而且不限於文學系的，我記得有「文學史」「尚書」等五課。黃純仁兄說：他十七年升文科後，選過上述兩項及另外一課。孟師說：尚書除盤庚等二三篇外，其餘都可背誦，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的寫。他的文學史沒有課本，以後才補發他自己寫鋼板的油印講義，一面起草稿，一面寫油印，常有塗改很多的地方。他上堂只帶幾枚粉筆，登臺後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絕地講，隨着興之所至的寫黑板，常常不管下課鐘聲的。

顧頡剛師的「上古史」是用他自著的「古史辯」做課本，那時只出第一冊，二冊後就用發給我們的講義做藍本了。他也是從廈門大學來的，和魯迅在廈大鬧得不愉快，所以顧來周走。「古史辯」有疑夏禹為無其人，而只是一條昆蟲的說法，我在校內刊物和在民國日報「雷雨」週刊（和農科程兆熊兄主編的。）為文辯駁其非是。期考的論文，我對這點也提出幾千字的研究意見，這樣，惹起顧師老羞成怒！他擬給以零分。還是其他先生勸他何必和學生意氣用事呢？給個六十分的及格分數吧！可是季師是支持我的論據的，他曾以此正式函請教育部，對於中小學教科書視為不當之甚，應予取締者，如顧頡剛之本國史，古代部份竟疑大禹為無其人，未免乖異，不應作為中學課本；如呂思勉之本國史竟左袒秦檜，而黜岳飛，顯違民族教育意義，如黎錦暉之毛毛雨，純為靡靡之音，而非正聲，這三種是均應禁止的。

五、充實圖書館及新校構想

中華民國十六年 六月一日